

中华文化
人学
书系

● 王启涛 著

天 汉 精 神

四川
教育
出版
社

中华文化  书系

天 汉

王启涛 著

精神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1·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汉精神：王启涛著.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1

(中华文化人学书系)

ISBN7-5408-3625-3

I. 天… II. 王… III. 人学—研究—中国—两汉
时代 IV. B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0590 号

责任编辑：陈蜀蓉 雷 蕾

技术编辑：王 凌

封面制作：何一兵

责任印制：吴晓光

中华文化人学书系

天汉精神

王启涛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610012)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地址：成都市人民北路 16 号 邮政编码：610081)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47 千

印数：1—3,000 册

ISBN7-5408-3625-3/K·60 定价：23.00 元

* * *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电话：(028) 83193012—3093

【内 容 提 要】

该书对汉代人学做了全面的考察。主张汉代文化中拥有不可估量的楚文化因子。而楚文化就是水文化。这种文化对汉代人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书中对董仲舒等学者的人学思想进行了重新剖析与定位。并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对汉代人学的来源与影响做了历时与共时的研究。

总

序

“人学”就是关于人的学问，而中国传统人学则是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思想家对人自身及其思想、行为的自我认识，它是涉及人的本性、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生价值、理想人格等诸方面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以人为核心、以天人观为框架、以道德说教为主要内容、以社会政治为最后归宿的特征相当明显，从而形成了与西方哲学相区别的民族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人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学术空前繁荣的诸子竞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期间所产生的种种学术思想，大致确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而几乎与此同时，古印度、古西亚、古希腊也发生了类似

的情况。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人类历史上的这一时期为“轴心时代”，依据他的说法，这是人类精神大觉醒的时期。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人学就是在这时期奠基了。

在远古文化的背景上，经过宫廷王官和民间知识分子的理性制作（这实际上是一种不断地“创造性误读”过程），“五经”在春秋时期基本形成定本，并走向民间。

“五经”的基本精神是一种“实践理性”，先民们开始对外在世界进行系统的、辩证的思考，并以典籍的形式将民族的基本精神加以定型。这几部文化元典以其首创性、广阔性、深邃性成为中华民族垂范永久的指针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定了春秋战国人学乃至后代人学的基本走向。

由孔子开创的先秦儒家人学，是中国传统人学的主流。

儒家人学的产生，以中原的自然环境为背景，以夏商周三代文化为温床。儒家的人学思想具有浓郁的伦理特征，缺乏思辨色彩，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儒家以“仁”、“礼”等观念为中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的品质、人格、道德、修养等问题，并对人作了初步的界定。在儒家的人学思想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对社会性的强调，而且人的这种社会性与伦理道德紧密相关，隐藏在这一表面特征背后的是坚定的价值信念。儒家坚信，亲亲（仁）和尊尊（礼）不仅是历史事实，也是人类的必然归宿。而先秦儒家大师孟子的性善论，则把理想人格根植于个体的内心世界，把道德的理想与道德的实践安置在同一层面，因此，孟子的人学思想具有极大的感染力量，从而对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儒家立足于现实社会去建立人学理论相反，道家玄想万物，思辨宇宙，洞察人生，他们反对已经异化了的仁义道德，从天道无为演绎出人道无为，否定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因而贯穿了一条自然主义的路线。道家在对世俗的价值观念作了整体否定之后，回归于道并且把握住这惟一的绝对。他们以为，至德之世不需要圣人，不需要政治，不需要人为的规范秩序，也不需要任何文明的成果，但却最完整地保持了人的自然本性。道家的人学理论虽然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它导致的是个人的解脱而不是社会的改造，但这种学说主张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宇宙中去，从而获得永恒的自由。道家这种对于个体生命意义的自觉探索，拓宽了价值关怀的领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以孔孟为代表的社会学派人学理论以及以老庄为代表的自然学派人学理论，构成了中国传统人学的历史主线，它们相互驳难，相互弥补，构成了中国传统人文的基本风貌。

秦帝国的建立，使法家压倒了诸子，但法家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漠视以及对个体人格的鄙夷，决定了它根本无力承担其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的重任。秦王朝的短命就是证明。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经过董仲舒重新阐释过的儒学成为官方思想。董仲舒人学理论的建构，就是把儒家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的王权相结合，从而使儒家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政治操作程式。然而，当儒学被神化发展到相当

程度时，它固有的理想光泽便丧失殆尽，普遍的道德变成了极其虚伪的东西，个体势必重新寻找其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东汉末年伤感文学的出现正是这种寻找的前奏，它预示着魏晋时期人学的再次繁荣。

魏晋士人放浪形骸，任意而为，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度。魏晋风度的背景是玄学。玄学的主题就是魏晋社会的主题，即人生价值在玄风中的回归。人们由此重新确定生命的价值。玄学注意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玄学家们看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人不仅仅是社会的人，也是自然的人，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然而，玄学的道家性格，最终使他们的担待意识失去了着落，只留下画地为牢的逍遥。这样，佛教就借机发展起来了。

从历史上看，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这在南北朝时就发生了。隋唐时期，儒释道互相渗透，互相排斥，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而佛教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即使在盛唐时期，我们也能够在豪迈的文字背后体会到一种对神奇的沉思；即使在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里，我们也不时地发现闪闪的“佛光”。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期，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战胜了宗教迷狂。理学家们把天人整体的本质归结为天理，认为天理就是人道与天道的合一，它既是伦理道德的本质，又是宇宙万物的本质。这样，先秦儒家所强调的“仁”，就不仅仅是人之必然，而且也是宇宙的必然。面对释道二教把越来越多的人引向消极的个人

解脱，理学家自觉地把个体生命的意义纳入到人类整体命运的视野中考察，表现出远远高于释道二教的关怀精神。

明朝中期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耗尽了它的内部生命力，中国社会正孕育着巨大的变化，表现在思想领域，则出现了反抗思潮和极端情绪，这在李贽的思想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权更迭，使得人们加深了对封建文化的怀疑。王夫之猛烈抨击专制独裁制度，反对压抑情欲，痛斥蒙昧主义，横扫奴化思想，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启蒙倾向。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更是石破天惊之作，作者为中国近代勾画了一幅民主主义的理想蓝图，他用“风雷之文”召唤“豪杰之士”起来冲破束缚，为争取真正的人的权利而斗争。

鸦片战争之后，窘迫的社会现实促使一些人把目光转向西方，而另一些人则更加迷恋传统。这种激烈的冲突，预示着中国人学正孕育着一场划时代的转变，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这种转变的标志。鲜明地把“立人”（即改造旧人、塑造新人）置于文化革命的首位，这是鲁迅超过同时代人的远见卓识，也使他成为一面伟大的旗帜。在随后一系列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古老的中华民族得以再生，而中华民族的心灵旅程也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

以上就是中国传统人学理论的基本脉络。

目前，中华民族已经迈进 21 世纪。21 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的世纪，它也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以人为本的世纪。因此，关注一下中国传统人学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终日为“物质”而奔波的人，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是否丢失了。中国传统人学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不可能

不对今日之现实产生某种影响。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但是，传统继续存在于现代化之中。实际上，现代化过程自身一直受到扎根于古老传统的多样文化形态的制约。我们以为，了解中国传统人学中的精华，对于今日之国人是有意义的，对于实施“以德治国”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儒家坚持平等比自由重要，同情比理性重要，礼教比法治重要，责任比权利重要，人际关怀比个人主义重要，这似乎与启蒙运动的价值取向相对立。因此，许多弘扬儒家学说的行为常常在西方引起冷嘲热讽。但是，现实告诉我们：从家庭到国家，所有层次上的社会危机正在证明社会正义、心灵沟通、相互理解、承担责任和休戚与共的意识，对于人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谓的儒家价值，正如启蒙价值一样，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在今日之中国，中国传统人学起码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1. 追求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在中国历史上的多元人学理论中，不同程度地体现着一种精神动力源泉，那就是对尽善尽美理想境界的追求，也可以说是对真善美和谐统一的追求。尽管各种学派对真善美的理解不同，但将真善美视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则并无不同。同时，中国传统人学的各个学派都将真善美视为天道的体现，这样，人类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中就实现了与天道的融合，即所谓的“天人合一”。

2. 具有一种历史主动精神，勇于承担天下之大任。作为中国传统人学主流的儒家学派，始终强调以天下为己

任，即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不言而喻的；墨家学派的四处奔波，也不过是为了“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法家学派虽然具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味道，但他们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以及为此勇于献身的精神，也具有一种感人的悲剧意味；至于道家学派，在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激烈抨击中，我们也不难体味到对人类历史以及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

3. 保持个体人格尊严，注重品德修养。中国传统人学虽然不如西方文化那样强调尊重个体人格，但并不是不尊重个体人格。对中国传统人学影响深远的“庄子精神”，不过是个体尊严、心灵自由等一系列相关概念的合成；即使是十分强调人之义务的儒家学派，其对于个体人格尊严的论述也不胜枚举。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人学始终将个体人格的尊严与品德修养结合起来，而且强调这种品德修养应该与为学相一致，与为政相一致。这样，个体的人格尊严与品德修养就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

4. 控制物欲，安贫乐道。对放纵物欲的抨击，始终是中国传统人学的主旋律之一。但是，一般地说，中国传统人学并不是极端地主张消灭物欲，而是强调要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同时，中国传统人学对物欲横流的抨击，往往与对统治者的抨击结合在一起，老庄学派就是这方面的证明。而儒家学派的“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更是向人类指出了较为理想的人生走向。总之，中国传统人学的“安贫乐道”不是强调以贫为荣，而是强调在财富与精神不可兼得时理应选择后者，这显然

是一种较为深沉的人文主义精神。

可以说，中国传统人学中以上几方面内容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将永远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此，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本书由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李殿元、张绍诚先生审订。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朝代。

汉代文化更是华夏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诚如海内外学人所言，“汉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不是显赫的战功和强盛的国势，而是辉煌的文学成就和耀眼的思想光芒。因此，对汉代的研究应该以文学和思想为两大主轴”。然而，“文学界、史学界、哲学界对汉代的研究，似乎都未曾给予应有的重视，以致汉代研究的成果，不及先秦、唐、宋等时代丰富，造成中国人对汉代研究仍停留在空浮式、远观式的境地，这是值得大家警惕的事”（见《汉代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其实，学术界对汉代文化研究的薄弱，还不止这些。李泽厚曾经指出：“汉代是中

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但几十年来对汉代思想却研究得很少。徐复观有三本《两汉思想史》的论著，大陆学人很少见到。徐书有好些可取之处。它对汉代专制政权摧残知识分子详加发掘，大书特书，证明文字狱由来已久，为前人所未道或语焉不详者。但由于这些论证似乎总有某些另外因素蕴藏其中，就不免显得片面或偏颇。特别是对汉代作为绵延数百年的统一大帝在思想史上投影的积极方面重视太不够了——而这，毕竟是事情的主要方面。不是吗？中华民族之有今天，12亿人口，广大疆域，共同文化……难道不正是由汉代奠定其稳固基础的吗？物质文明是这样，精神文明方面，例如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不也是基本形成于这个时期吗？所以我不同意大多数哲学史著作对汉代主流思想低估轻视，一笔带过或横加抹杀的流行看法。”（李泽厚为金春峰《汉代哲学史》所作的序。参考金春峰：《汉代哲学史》，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因此，对汉代哲学与思想进行新的总结，是摆在当代学人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以人为核心、以天人观为框架、以道德说教为主要内容，以社会政治为最后归宿的特征相当明显，从而形成了与西方哲学相区别的民族性。因此，人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汉代哲学亦不例外。

在考察和研究汉代哲学尤其是汉代人学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四字正是汉代人提出来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

“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对该词的解释颇为精到：“本谓弄清事实，求得正确的结论。后多指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不缩小，正确地对待和处理问题。”我们正应该这样来研究汉代的哲学与人学。诚然，我们应该在崭新的世纪，以崭新的思维与理念，大胆地发现和评介汉代的人学成就与光芒，但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对汉代某一时段践踏人格、残害生命的事实视而不见。我们也可以将汉代人文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作比较，但横向比较不能掩盖两种文化在纵向发展与思想内核方面的异质性，我们也可以全力挖掘一代大儒董仲舒的人学光华，但也必须认识到，他的人学理论的建构，是把儒家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的王权相结合，从而使儒家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政治操作模式。当这种儒学被神化到相当程度时，它的理想光泽便丧失殆尽，普遍的道德变成了极其虚伪的东西，个体势必重新寻找其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走出谶纬，走出烦琐，挣脱思想的牢狱与桎梏，从而实现人学的再次复兴与繁荣，就成为势所必然了。

由于本书主要是总结汉代的人学成就，所以从积极方面着力较多，但汉代哲学中反人学的一面也是我们从未忘记的。虽然它不是主旋律，但一直会在我们的耳边响起，以提醒我们在对汉代的人学史进行总结时，千万不能“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们准备在本书里对汉代的人学作一番较为务实而新颖的考察。

我们曾将汉代的思想与文化发展同西方的“文艺复

兴”(Renaissance)运动作过有趣的比较,发现它们有四个方面的相似。

首先,它们都重古典。

西方的“文艺复兴”,顾名思义,是对古典文化尤其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无论有学问的人或一般人民,他们的感情都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整个古典文化那一方面去,而在这个国家里(按:指意大利)的大批古迹和文献也特别有利于他们回到过去。”(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68页,商务印书馆,1996)在当时,人们为复兴古典文化做了大量的收集、整理工作,“如果不是由于那个时代的收集家不遗余力、不怕困难地来从事搜求的热情,我们一定只能拥有我们手中现在所有的文学作品的一小部分,特别是希腊人的文学作品。当教皇尼古拉五世还不过是一个普通教士的时候,他曾由于购买手稿或者请人抄写手稿而身负重债。抄书手给他抄书,调查员给他搜寻资料,范围之广,遍及于半个世界”(引文同上)。14世纪以后,古代的希腊、罗马以及拜占庭的文化典籍才陆续从阿拉伯人西侵和十字军东征以后,重新传入欧洲。于是,广袤的欧洲(尤其是西欧)来了个“古代学术——它的语言、文化风格和道德思维的复活”(《大英百科全书》,660页,1974)。而中国的汉代文化恰好与此类似。秦人焚书坑儒和项羽火烧阿房宫之后,“六艺从此缺焉”(《汉书·儒林传》)。然而,汉人却对古典秘籍厚爱有加,从文献上可证,汉初之萧何就是如此。“《三辅黄图》载: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藏入关所得秦之书籍”(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

理》),于是,“《诗》《书》即往往间出”(《史记·太史书自序》),“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尤其是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刘歆《七略》),加之叔孙通、河间献王和许多古典博士们的齐心协力,终于在“百年之间,书积如邱山”(刘歆《七略》),汉代文化就在这巍峨的先秦古典文化的高山上建立起来了。

第二,它们都重博学。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这些巨人之所以“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多——他们的成果绚丽多彩;二、广——所涉猎的领域极其广阔;三、深——所研究的学科极其深邃(陈小川等:《文艺复兴史纲》,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而中国汉代的学术大师们何尝不是如此,顾颉刚曾指出:“汉代的学术方面尚有很多辉煌的果实,例如唐都、落下闳、邓平、刘歆、张衡的天文学和历法学,张衡的地震学,王景、桑钦的地理学,赵过的农学,许高、平当、贾让的水利学,淳于意、张机、华佗的医学,马钧的机械学,桑弘羊、桓宽、王符、仲长统的经济政治学说,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和班彪、班固父子以及荀悦、蔡邕的史学,刘向、刘歆父子的古籍考订学,扬雄、爱礼、甄丰、服虔、许慎、马融、郑玄的文字学和训诂学,以及王充的唯物主义的怀疑思想等等,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上海古籍出